□ 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

“三教交锋”：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

李桂奎

随着儒学发展、佛教传入、道教勃兴，三股思潮在魏晋时期激荡交锋。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，如何坚持文化自信，实现固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，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。

儒释道“三教”交锋的形成

本土的儒家与道家向来互通有无，即所谓的“儒道互补”，因而有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传说。这是后世儒教与道教关系的基础。

自西汉武帝霸气地推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以来，儒家思想在维护君权神授的专制统治过程中，逐渐被宗教化。东汉末年，儒教逐渐蜕变为荒诞迷信色彩浓重的谶纬之学，遭到王充等人的猛烈抨击，面临信任危机。这时，由先秦老庄、汉代黄老一路走来，以修炼成仙为基本追求的道教勃然而兴。其中，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以及随后张角的太平道，影响愈演愈烈，并点燃了东汉末黄巾大动乱的烽火。

尽管儒教人士对民间的道教信仰时有微词，但道教徒们却一厢情愿地支持儒家伦理。魏晋时期，以儒道相调和的面貌出现的玄学实际上偏于道家。即使解释儒家经典，玄学家们依据的也是老庄思想，故也有“新道家”之称。再说，大约在西汉末年，佛教从古印度悄然传入，并潜滋暗长。魏晋时期，佛教徒们因羽翼尚未丰满，也纷纷用老庄思想来解释佛经。就连净土宗始祖、东晋高僧慧远大师也曾引老、庄之义以解说佛经《高僧传》，同时他精通儒学，关心时务，有“政治和尚”之称。时至东晋，儒释道“三教”或经过脱胎换骨，或经过源源不断的输入，均积聚起一定的规模和实力，彼此鼎立格局得以形成。

“儒”“佛”的碰撞与磨合

佛教传入中国后，首先直接面对的是被奉为正统的儒教。汉末魏初，面对儒生们对佛教发出的“夷狄之术”的攻击，佛教信奉者只能通过强调儒佛一体或不离不弃来回应。牟子撰《理惑论》构设三十七问，表明儒、佛关系如同金与玉、精与魄，指出事佛与行尧舜周孔之道本是一回事；三国时期的僧侣康僧会则提出了“儒佛同一”观，并以佛教的“仁道”附会孟子的“仁政”，把“仁”视为佛的最高境界；东晋人孙绰在《喻道论》中提出“儒即佛、佛即儒”，认为儒、佛在根本旨趣上也是同一的。大致说，“联儒辟道”是当时佛教徒们的生存策略。

但这并未避免“儒”“佛”二教的交锋。儒教徒抨击佛教剃须发、不娶妻、不敬养父母等制度有违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“养老送终”等儒教“孝道”；并抨击佛教不理民生、不事王事、不敬王者等出世主义违背了“忠道”，从而攻讦佛教不符合中国国情。佛教徒则力辩佛教于民生、治道有益无害。如东晋高僧慧远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就说佛教徒是把奉亲敬君置于人生第一，而且在得不到君亲信任时能退而反省，直至觉悟。

当时，儒佛交锋还集中表现于“神”的存灭、因果报应等教理上。佛教徒提出了一套“神明成佛”理论，把成佛作为理想目标；而儒教徒则提出“形神相即”“形质神用”“形死神灭”等观点予以回应。晋宋齐梁期间，围绕神灭、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论争旷日持久，并波及后世。

“道”“佛”的交锋及其战果

由于儒教难以抗衡，佛教注意与其缓和关系，转而与共同“在野”的道教发生激烈交锋。尽管佛道共同提倡“出世”，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、肉体成仙，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、涅槃寂灭，教义自是不同。

为了争夺生存空间，两教分别编造谎言，制造谣言挤兑对方。道教徒的杀手锏是强调自己有着汉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华夏起源，抛出“夷夏之辩”来攻击佛教的“外来户”身份，并时常以“老子化胡说”来贬低佛教。西晋末年，身为祭酒的道教徒王浮与当时贵族出身的僧人帛远展开辩论，但屡辩屡输。无奈之下，他借着当时流传的“老子化胡说”，将《西域传》改头换面，伪造出《老子化胡经》，宣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。道教徒们宣扬的“化胡说”自然立足于“华尊夷卑”观念，仰仗本土文化的优越感拒斥外来的文化价值，甚至强悍地认为夷狄“难于见理”。

对此，佛教徒们不甘示弱，以牙还牙，也如法炮制，伪造各种文献，或声称老子转世为佛弟子迦叶，或分派迦叶转生为老子等，来降低道教的身份。为争信徒，佛道二教各自使出浑身解数。

“三教”交锋中的因缘际会

当年儒释道“三教”之间的交锋，也留下了不少美谈。

相传和尚慧远居庐山东林寺时，送客、迎客皆足不过溪。若过溪，寺后老虎就会吼叫，因而此溪被称为“虎溪”。一次，儒士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来访，三人聊得非常投缘，慧远送别他们时，不经意间越过了虎溪，虎即吼叫起来，三人相视大笑。这就是“虎溪三笑”美谈。

关于佛道之间的敌视及其消弭情景，还有下列故事：东晋将领、权臣桓玄信奉道教，最初对佛教多有裁抑。有一次，他征伐行军途径庐山，便居高临下地传令慧远出虎溪一见，但慧远却坚守规矩，称病不出。桓玄只好气势汹汹地自己入山。哪知一见慧远的庄严神韵，不禁肃然起敬。会面期间，桓玄拿《孝经》中“身体肤发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来诘难慧远“剪削”（剃发）为僧。慧远非常从容地遣用了《孝经》的话予以应答：“立身行道。”桓玄被彻底折服了。后来他登基为帝，对佛教表示友好。

从以上传说来看，儒释道“三教”的交锋并非你死我活，而是有所敌视，有所包容。事实上，当年许多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变动不居的，许多名流还一身兼“三教”。

回顾“三教”交锋图景的现实意义

魏晋时期，“三教”交锋的舞台已经搭起，其融合的大戏也已经开幕，为后世上演了更多精彩绝伦的好戏打下了基础。军事冲突往往两败俱伤，宗教争锋常常是双赢。从大唐盛世至今，“三教”之间不断地在强强争锋中“合流”融通，又不时地在“合流”融通中擦出争锋的“火花”。这种碰撞与交融一直在助推着中华文明的进程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2014年，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：“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，但传入中国后，经过长期演化，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，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，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、哲学观念、文学艺术、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。”“2000多年来，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，中国音乐、绘画、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。”对佛教以及其他外来宗教对中国文化建设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。

当今，“三教”发展又得到重视。2016年，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：“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、核心教义、礼仪制度的同时，深入挖掘各自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、时代进步、健康文明的内容。这就要求我国宗教与时俱进、革新发展，努力发扬积极因素、淘汰消极内容，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、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。”

回首以往，中国本土的儒道二教继续在互补中前行，外来佛教也早已在与儒道争锋融合后化入到中华文化体系中，这种多教“相生相克”的传统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繁荣；展望未来，已成为我们文化自信有机构成的儒释道“三教”，也必将通过创造性转化而大大有益于世界文明进程。

（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
（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）

□ 汉字故事

音乐家爱『聪』　书画家爱『石』

杨立新

本人在平时的阅读中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起名现象，那就是音乐家的名字中多“聪”字，书画家的名号中多“石”字。

先看与“聪”字结缘的音乐家。这其中，最著名的莫过于音乐界的“二聪”——著名小提琴家、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和著名钢琴家傅聪。此外，名中带“聪”的音乐家还有很多。如为电视连续剧《芈月传》配乐的“亚洲第一排箫王子”杜聪，中央民族乐团琵琶独奏演员、声部首席赵聪，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、华人指挥叶聪，为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作曲获得第六十届奥斯卡最佳原作音乐奖的华裔作曲家苏聪，还有前几年去世的享有香港“音乐教父”和“巨星之父”之誉的戴思聪。甚至连日本著名演员、音乐人妻夫木聪，其名字中也有一个“聪”字。

那么，音乐家为何青睐“聪”字？关于“聪”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为：“聪，察也。”《管子·宙合》称：“闻审谓之聪。”《庄子·外物》亦曰：“耳彻为聪。”故“聪”是听觉灵敏的意思，只有“耳聪”才能十分准确地辨别音律，因此拥有一双听觉敏锐的耳朵对音乐家来说至关重要。春秋时期的晋国乐师师旷生而无目，但听觉敏锐，善音律，以“师旷之聪”闻名于世。人民音乐家聂耳原名聂守信，据说他天生听力超常，大家都说，只要能从他耳朵进去的，就能从他嘴里唱出来，便送他“耳朵先生”的外号，他索性将名字改为聂耳，并在自用便笺上印上了“耳、耳、耳、耳”，这样他的名字便由4个“耳”字组成（繁体字聂为“聶”）。

与音乐界的“二聪”一样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画坛上也有著名的“二石”：北方的齐白石和南方的傅抱石。当时有一副颇有意趣的对联，上联说的就是二人的名字：“齐白石，傅抱石，老石少石，两石画坛同突兀。”

师旷像

以“石”为名字的书画家还有清代著名书法篆刻家邓石如，晚清民国艺术大师吴昌硕（字苍石、仓石、昌石、昌硕，别号石尊者，且以带“石”的“昌硕”闻名于世）。当代则有学院派书法家胡小石，书画家尹瘦石，书法家欧阳中石，山水画家白雪石，等等。

至于以“石”为号的书画家更是不胜枚举。如南宋著名词人、书法家姜夔与白石洞天为邻，因号白石道人；元代著名画家、诗人王冕，号煮石山农；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，号石田、白石翁；明代画家蓝瑛，号石头陀；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与清末画家董麟山，均号石樵；清代书画家戴本孝，号太华石屋叟。

还有一些本不姓石的“石姓”书画家。如明末清初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“四僧”中也有“二石”：石涛原名朱若极，为明皇室后裔；另一位是以字行于世的石溪，俗姓刘，法名髡残，又号石道人。当代长安画派著名画家石鲁，原名冯亚珩，因崇拜石涛和鲁迅而改名。

那么，书画家为何爱以“石”字入名号？文士嗜石，脱胎于远古先民的崇山理念及文化积淀。唐宋时期，石头被文人供于书斋，欣赏把玩，入诗入画。唐相牛僧孺对奇石“待之如宾友，视之如贤哲，重之如宝玉，爱之如儿孙”。北宋书画家米芾遇石则拜，口称“石兄”“石丈”，时人戏称为“石痴”。

石头之所以为历代文人书画家所青睐，就在于“方寸之地纳万千气象，蕞尔之石寓山岳精神”，小小拳石蕴涵了山川峰峦雄奇险秀之神韵，使人们睹之可悟小中见大、丑中见美之哲理。“石中乾坤大，石外意蕴深”，书画家们通过以石悟道，将内心的精神追求寄寓在这小小的顽石之中，并欣然将其纳入自己的名号，与石为一，物我相融。

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《〈通用规范汉字表〉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》阶段成果）

□ 中国最美古村

龙宫村：神山仙脉通龙宫

王锦强

浙东宁海县众多古村落中保存着120座左右的古戏台、近千座的祠堂等文化建筑，至今还散发着泥土的芳香。由于木结构建筑具有良好的弹性缓冲外支撑力，因此在宁海，无论水村、滨溪，还是山居或闹市村落，其建筑结构多以木质梁架支撑，即使遇地震或风暴“墙倒而屋不倒”。

宁海县深甽镇辖下的龙宫村，原称龙溪名村，明时改称龙宫，并沿用至今。龙宫村《陈氏宗谱》记载，陈姓北宋年间由新昌平湖迁入，并繁衍成为一个古老家族村落，村内99%的居民都姓陈。

龙宫村地处天台华顶山北麓，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浑然一体。村前山峦波澜起伏如蛟龙盘踞名为龙山；村前大溪似蛟龙出岫名为龙溪；村南石潭因潭壁呈现龙卧痕迹而名龙潭，世传此潭为蛟龙栖息之地。村中樵坑溪畔有株450余年的枫杨树，形状如龙号称龙树；宗祠内还保存着两条形神俱似“龙”的树根。龙宫村山水树木多以龙名之，“龙”元素的融入使得龙宫村平添一份神秘与灵秀。这种“山水”和“神灵”的融合，使龙宫村成为浙东山水古村的典型代表。

龙宫村保留下了一批完整的明清时期古建筑群，以古祠、旧宅和老街为主，主要分布于陈祠路、樵坑路两侧，多为四合院或三合院，单体建筑随地赋型。乡间的大宅“三合院”和“四合院”符合儒家尊卑礼制伦理道德的居住形制。屋面和墙头戗脊及马头墙可以反映出房主的权势，建筑物外观也做了壮美的标志，当然也有防火隔离的效果。

龙宫村旧时民生凋敝，居所只求遮风避雨，茅屋或泥墙矮屋是其主流。一些殷实之家用青砖砌墙，瓦片盖顶，木头作柱、梁、桁、椽，墙面涂成白色、青色或黑色。明末至清，出现了三合院或四合院。再后来，民宅建筑吸收了西方简洁典雅的建筑风格，又保留了传统的木框架砖木结构，高高的封火墙、青瓦覆盖的人字坡屋顶、木雕牛腿、格子门窗，为古朴的建筑群舍烙下民国印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龙宫村遗留的古宅有33处290余间。

陈氏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的地方，也是他们凝聚情感的精神圣地。村内至今仍保留着三座完整的陈氏祠堂——宗祠“星聚堂”、新祠“崇德堂”、支祠“三之堂”。除“崇德堂”改为育英书院外，宗祠和支祠基本保持原貌。两座宗祠规模庞大，雕刻精美。古戏台更是建筑艺术的高峰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序。

龙宫古村至今还延续着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，如捣年糕、竹编和婚丧、节庆习俗等，具有浓郁的旧时农村风貌，渗透着特有的民间文化气息。如今，龙宫古村的街头巷尾，成了附近三里五村文艺爱好者的聚集地。村民们用民间乐器演绎着关于龙宫的“世说新语”，叙述着他们对山水田园生活的感受和理解。